

〔美〕林达·约翰逊 主编 成一农 译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帝国晚期的 江南城市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林达·约翰逊 主编 成一农 译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帝国晚期的

江南城市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 (美) 约翰逊 (Johnson, L. C.) 主编; 成一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书名原文: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SBN 7-208-05589-0

I. 帝... II. ①约... ②成... III. 城市史—华东地区—12世纪~19世纪 IV. 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4099 号

责任编辑 刘 影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美] 林达·约翰逊 主编

成一农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6 字数 209,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589-0/K·1108

定价 20.00 元

中文版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史研究领域的扩大与深入,中国学术界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在国外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城市史论著,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使国内学者了解了国外城市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特别是施坚雅一书的翻译出版,虽然较英文第一版的刊行推迟了二十年,但是对于中国学界的城市史研究依然起着很好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不过相比之下,这些著述的创作稍嫌早了一些,对中国古代中小城市的研究也显得弱了一些,因此,我们一直期待能够有最近几年研究中国城市的国外著作翻译出版。不负众望,由成一农翻译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现在奉献给读者,这部译著反映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是美国学者林达·约翰逊(Linda Cooke Johnson)主编,1993 年纽约州立大学出版。该书汇集了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和日本学者对中国长江下游苏州、杭州、扬州和上海等城市的研究,可以说至少体现了当前国外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最新方法和视角。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为该书撰写的导言,更是站在学术的前沿,对目前国外学术界区域与城市研究的焦点、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不仅使我们对国外区域与城市研究的最新进展耳目一新,而且对于我们今后如何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具有指导意义。

在这里,我愿意介绍一下本书的译者成一农。作为他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我对他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成一农在读硕士期间就对城市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表了一些有关古代城市的论文。在其读书研习过程中,成一农经常关注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尝试翻译过一些较为重要的国外学术论文,其中就包括本书罗威廉教授的导言。该译文发表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刊物《历史地理》第十八辑上,译文发表之后,曾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兴趣,因此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他在博士后工作期间终于将全书翻译完成。成一农在翻译过程中兢兢业业,并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意译,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原书论文中引用的大量方志和文集都能一一查对出处、核定原文,为读者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最后,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学术翻译工作,将更多有价值的国外研究论著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振兴中华学术。

李孝聪

2004年11月26日

序 言

本书是来自四个国家的六位学者努力耕耘的结果,他们搜集了“江南”这一单一核心区域中某些与城市历史相关的资料。“江南”照字面意思,指的是“长江以南”,而近代更多地被认为是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主要组成部分。^[1]“江南”一词起源于唐代,不过当时它所涵盖的地域很大,主要包括今天江苏、江西、安徽和浙江省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这一用语从唐代到清代,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到清前期,它成为江南省的省名,不过江南省存在的时间不长。康熙统治时期,江南省被分为安徽省和江苏省,并沿用至今。但是“江南”一词仍作为常用的口语在使用,用来指代“长江以南”的地区。^[2]本书中,尽管江苏省的扬州位于长江的北岸,这一地区有时被称为“江北”(长江以北),或者被称为“苏北”(江苏北部),但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该地区和苏州、杭州、南京以及上海一样被认为是江南的一部分。

江南的面积略小于现代的法国,据说在中华帝国晚期,这里是

[1] 那些对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阐述的宏观区域概念不熟悉的读者,请参阅附录一。在附录一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2] 江南一词最早包括现代的浙江、福建、江苏和湖北省,但是此后,特别是唐代的江南道则局限于江苏、安徽和浙江长江以南的部分。在唐末,这一地区被分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浙江和福建的一部分包括在江南东道的范围内,治所在杭州。江苏和安徽以及湖北的一部分包括在江南西道的范围内,治所在苏州。《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新版(台北:1980),第326页。

最繁荣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两个王朝的首都(南宋的杭州、明代的南京)都在这里;还有苏州,是不同时期一些割据政权的首都。在帝国晚期以前,苏州作为一个主要的城市,拥有上百万的人口。扬州,是江北著名的盐城,早在隋唐时期就被誉为是南方文化的缩影,并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再次崛起。上海,位于中国棉产区的中心,在宋朝之后就已经成为重要的港口和县城,到了清代更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海港。本书中的五篇论文分析了江南的苏州、杭州、扬州和上海这四座城市,时间跨度则是从南宋到清中叶(1150—1840),大约七百年。在这一时段内,本书论述的江南城市中缺少了南京,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这五篇论文涉及四座城市,通过独特的个案研究,分析了中国城市历史的不同方面。其中的三篇论文,即关于苏州的第一篇论文和另两篇关于扬州和上海的论文,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入手。剩下的两篇,即关于苏州的第二篇论文和关于杭州的论文,注意力则集中在社会历史方面,关注城市冲突和阶级差别。

通过将研究局限于单一的地理和经济区域,我们试图提供一个限于同一时段的空间尺度;本书所涉及的城市与相邻的城市之间的距离没有一个超过100公里。同时,我们也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稍微宽泛的时间跨度,来提供一个充分的年代范围。这些论文选择的及其所研究的城市表达了我们的一个观点,即:江南在中华帝国晚期无疑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且在某些方面与帝国的其他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别。就像施坚雅所提出的,江南拥有一个完整的城市发展体系,从低级的、不到百户人家的小市镇到拥有超过百万居民的大城市;^[1]这

[1] 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2页。(G. William Skinner,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11—249, especially p. 238)

本书中的论文也支持这个观点。然而就像这些论文所证明的,这个层级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杭州和南京在作为王朝首都的时候都是最主要的城市,但是明代的杭州与宋代鼎盛的杭州相比明显地衰退了,而南京在明代国都迁往北京之后也在不断地衰落。结果,苏州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段内都位于城市体系的顶端。扬州在明清时期地位变得十分重要,随后是上海的崛起,并在清代成为一个主要的港口城市。

由于苏州的凸显地位,本书中有两篇关于它的论文。苏州是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也可以说是整个帝国范围内,人口最多,最雅致,也是最繁荣的城市。在南宋时期,杭州作为帝国实际上的首都,规模更大,但在蒙古占领以后,它在城市面积和影响力方面都迅速地下降。对比之下,苏州,不仅在宋代因为临近杭州而不断发展,而且在明清时期规模更加膨胀,重要性更加增强。按照马默教授(Michael Marmé)所引用的一种通俗看法,这两个江南城市非常类似,都可以称为天堂。即使其临近的另一个江南城市——南京,在明朝早期成为了帝国的首都,苏州依然保持了它的城市规模和突出地位。随着明朝国都的北迁,南京由此衰落,苏州从中受益,再次上升为地区中心城市。因而,就像马默和保罗·圣安杰洛(Paolo Santangelo)教授的论文所表达的,苏州在这一时期保持了其突出的地位,但这常常是建立于个体的贫穷和痛苦之上的。马默教授的论文追溯了三百年间苏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它所付出的代价。圣安杰洛教授的论文考察了明清之际及其之后几个世纪内城市精英和劳工阶层的发展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别。

同时,次级城市中心在这一时期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在不同的时期,杭州、南京、扬州最后是上海先后在江南地区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杭州,现在浙江省的省会和政府所在地,即使在王朝首都迁移之后,由于本身优越的条件,依然是重要的城市。城市内部的

政治和社会运动是夫马进(Susumu Fuma)教授论文研究的焦点,他论述了明代杭州由于当地特殊原因而产生的社会暴动并没有蔓延成普遍的反抗腐败王朝和宦官统治的社会运动。

凭借对盐业的垄断而获得空前经济繁荣的扬州,并不属于字面意义上的“长江以南”地区,但是自从隋炀帝被南方舒适的环境所陶醉之后,它在文化上总是被认为是江南的一部分。就像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 Finnane)教授向我们展示的,在明代和清代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城市有着与江南地区同样的社会和文化特点,同时享受着自己繁荣的经济,并由此成为晚期帝国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海是最后才在经济上崛起的江南城市,但是,就像约翰逊(Linda Cooke Johnson)教授论证的,上海在宋代之后就已经成为重要的海港,在明代由于当地棉纺织业的发展,它的经济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虽然它作为港口的重要性在17世纪中叶康熙解除禁海令之后有所上升,但直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南方商人聚集在这里重新开始进行海外贸易之后,上海才迅速发展起来。

本书出版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将四大洲从事于江南城市历史研究的学者联合起来;参与这一研究的学者中,有三位,即约翰逊(Linda Cooke Johnson)、马默(Michael Marmé)、罗威廉(William T. Rowe)来自美国;圣安杰洛(Paolo Santangelo)来自意大利;安东尼娅(Antonia Finnane)来自澳大利亚;夫马进(Susumu Fuma)代表日本学界。这一选择反映了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即将注意力集中于单一主题即城市历史,具体而言就是用区域观点研究江南城市。非常遗憾的是,本书缺乏中国学者的参与,因此不能具有全面的代表性,但就像书中每一篇论文所展现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同行提供的大量材料。

这些论文在研究范围、视角和作者研究的细节层次上都有所不同,这反映了学者研究的不同模式。英语作者对当代的研究方法非

常敏锐,并且使用空间组织图表、经济学的解释和“早期帝国主义”来讨论问题。与其他两篇论文的学术传统不同,他们较少注意细节的描述,而是尽可能多地进行深入的分析。对比之下,日本和意大利学者的两篇论文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且与英文作者不同,他们对中文第一手材料有着良好的理解,并提供给读者更为精密的细节描述。

最后,尽管置于所有其他论文的前头,罗威廉教授的文章是将这些论文放在中国历史城市研究的大背景中进行介绍。罗教授不仅回顾了学术前沿,而且通过这些研究,明确地提出了几个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空间,经济的发展、停滞和连贯性,技术,政府的干预以及社会冲突等。他提出了汉学研究中区域分析的问题,并且讨论了城市及其腹地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城市在各自的腹地中的嵌入程度如何?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利益对圣安杰洛和夫马进的论文中提及的社会冲突影响程度有多大?这是一个在所有这五篇论文中都出现和讨论过的问题。

本书起因于马默教授为1989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会议而组织的江南城市历史研究小组。在这里要感谢马默教授能够接受这一项目并组织了研究小组。罗威廉和伊夫林(Evelyn S. Rawski)教授是小组的成员,向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指导和批评。罗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导言就是他不断支持的很好证明,伊夫林教授的鼓励和帮助也让我们感谢不尽。我还要向罗兰(Roland Higgins)教授表示感谢,她不仅在南京这个论题方面知识渊博,而且为本书向夫马进教授征集了论文。我们还要感谢罗威廉教授,正是他说服圣安杰洛教授加入这一课题。此外,约翰逊(William C. Johnson)教授为本书设计和绘制了图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绘图室提供了本书的地图,在此我们也致以真诚的谢意。

目 录

中文版序 李孝聪

序言 林达·约翰逊

导言：长江下游的城市与区域..... 罗威廉 1

第一章 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1127—1550 21

第二章 晚明杭州的城市改革和民变 60

第三章 帝国晚期的苏州城市社会 97

第四章 扬州：清帝国的一座中心城市 147

第五章 上海：一个正在崛起的江南港口城市，1683—1840 191

附录..... 233

参考文献..... 238

图表目录

图表 1 元代江南地区 20

2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图表 2	绘制于 1229 年的宋代石刻平江府图	31
图表 3	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人口统计(按户数统计),1290—1393	36
图表 4	明代苏州城图	50
图表 5	明代杭州城图	86
图表 6	纺织产品生产组织结构图	122
图表 7	明代的价格、工资、棉花和铜银比率	139
图表 8	清代的江南	146
图表 9	清代的江苏北部地区(江北)	157
图表 10	清代扬州城图	169
图表 11	清代上海地图	217
图表 12	上海行会的建造和重修,1644—1851	219
图表 13	“南京布”的出口,1786—1835	228

导言：长江下游的城市与区域

罗威廉(William T. Rowe)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施坚雅(G. W. Skinner)和伊懋可(Mark Elvin)合著的具有开创性质的著作出版以后,我们关于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知识和评价大量增加了。^[1]简言之,首先,关于中国城市只存在单一模式的观点逐渐变得站不住脚;其次,以前认为受西方影响的开埠港口城市和中国本土城市之间存在着差别的观点,也变得勉强,至少这两者间的界限已经难以判断;再次,过去对于中国社会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不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我们开始越来越注重过去时代中国城市变革的一种或多种模式。

毫无疑问,在施坚雅的研究方法提出以前,我们对于推进中国城市研究所依靠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事例研究,即专题性的“城市史”或对单一城市的政治、妇女、劳动力、商人等方面的专

[1]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ark Elvin and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题研究。^[1]在这些研究中,特别是在英文著作中,至少存在两种倾向,它们都出自历史学家使其研究成果不仅只是一份好的文献记录,而且对于理解我们现实生活有益的目的。这两种倾向中,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等级更低的市镇的研究,但是帝国晚期的大部分居民都生活在这些地方。纠正这种学术上的不平衡不能等到将来,应该从我们现在这一刻就开始。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中国的工业化时代(即20世纪),至多上溯到帝国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这种不足在本书中将得到纠正,本书的作者们在研究帝国晚期城市时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上,并将研究的时间推回到过去的七个世纪。

我们每一个作者都对各自研究的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和上海的空间利用和随时间变化的土地利用模式给予了很大关注。他们在研究中,吸收了几年前牟复礼(F. W. Mote)在一系列关于苏州、南京的论文中提出的带有启发性的观点,在这些论文中牟复礼提出了中国城市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即城市形态在长时期内保持稳定。^[2]本

[1] 这方面的简明书目包括 David Buck, *Urban Change in Chi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7); Kenneth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and *Hankou: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1989);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and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F. W. 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9 (1973), pp. 35—65;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Skinner,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01—154.

书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me)在关于苏州的论文中,运用了牟复礼的独创性观点,描绘了苏州从1229年至1945年的城市轮廓图。这些地图显示出苏州城的形态确实变化很小,从而支持了牟复礼的观点,而且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 Finnane)表示这种观察视角“也非常适合用来研究扬州”。

作者们对这些城市发展模式的描述令人惊奇地一致,他们描绘的城市有共同的发展历程,这与牟复礼所提出的中国城市在形态上停滞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相吻合。所有这些城市,经济繁荣的阶段导致了城市空间的扩张,这种扩张在我们的作者看来是受到市场的驱动。这意味着是一种超越城墙的扩张运动,于是在一些案例中出现了城墙被重建以适应城市扩展的现实。城墙外的商业区位于主要贸易路线的终点,这同时也使边远的市镇成为急剧扩大的大都会区域的一部分,这就是迈克尔·马默所定义的“都市阴影”。与此相伴的是唐代坊市制类型城市经过规划部分的长期衰落:相互分离的官方限定的市场体系的崩溃,没有经过规划的街道大量出现,城市的多中心化,复杂的居住模式大量增加,以及土地利用按功能划分的趋势。同时,所有我们研究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出现甚至发展到行政和经济部门在空间上的高度分离;与此同时,是城市内部和外部的区分,尽管这种现象并不十分明显清晰。

我们在这里将要提出以下问题:城市形态的停滞是否受政治权威的强迫?城市的动态变化是否是在民间行业的驱动下进行的?市场是否决定土地的价格?是否迈克尔·马默强调的“国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力”是一种简单的错误,还是安东尼娅认为的“基本的城市空间是按惯例和官绅阶层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传统组织的”呢?从牟复礼绘制的地图来看,他们都不对。同时本书中介绍的证据和其他一些近来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对这类问题不要

接受轻率的、单方面的结论。

这些研究中提出的同样重要和模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城市的地位会上升或下降?毫不奇怪,本书的作者认为是生态和技术上平衡的结果,这或许正确或许错误。在一种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地形和其他生态条件会使一些城市的繁荣和吸引力超过其他城市;但随着生态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有利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于是会形成新的中心地。同时其他地区就相对衰落了。在中国的例证,如:汽船的使用造成长沙的地位上升并超过了湘潭;世界其他地区的例证,如:由于铁路的使用,造成巴尔的摩取代了查尔斯顿,芝加哥取代了圣路易。类似的例证俯拾皆是。

在长江下游地区,汉朝时期长江和淮水间运河的通航,刺激了扬州(指汉代的广陵)的兴起,然而后来黄河的南摆却减少了这个城市发展成中心地的潜能。苏州,由于明永乐时期江南运河的重新开通,取代了杭州。上海的崛起,则是由于吴淞江在 11 至 12 世纪的摆动,这种摆动同时使一度繁荣的青龙镇永远地衰落下去。而 19 世纪,大运河衰落后,每年运往北方的贡米改由海路运输,这更刺激了上海的进一步发展。

在以上的例子中,运输技术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其他技术的创新也往往具有同样的主导作用。例如,苏州虽然土地肥沃但由于地势低洼、水患严重,因此只有在宋和明初两次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解决这一问题后,苏州才有可能发展成对周围地区具有集散职能的重要城市。上海的兴起与此类似,受益于三角洲腹地于 13 世纪开始不断兴起的棉花种植技术的革新,而棉花又是其三角洲腹地的大宗产品。扬州的繁荣无须多言,主要受制于制盐技术发展的影响,它所提供的两淮地区的盐比其他地区的盐更有竞争力。尽管这是政府的专买专卖,但市场上对不同地区盐产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者食盐习惯的影响。

本书的作者通过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行政命令对于城市地位的升降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往往超越了生态和技术因素。这种结论并不完全出乎意料。“中国城市”的模式是由马克斯·韦伯(Marx Web)提出的，他对此也作了大量的预言；而且20世纪研究中国城市化历史资格最老的学者施坚雅在他的区域循环模式中指出，首先和最主要的驱动力是市场因素，同时也谨慎地指出政治在其中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都城的重新定位，与都市及其所在区域命运攸关的对外贸易权与垄断权的授予或废止。^[1]本书的这些研究中提出的例证是强有力的，以至于让人怀疑施坚雅的市场模式是否成立。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地域广大的中央集权制官僚国家来说，决定中心地等级地位时，政治因素确实起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

在长江下游的城市中，从南京在行政体系等级中变化的历史来看，它受到这种行政因素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非常类似于郝若贝(Harttwel)所研究的开封。^[2]但是迈克尔·马默认为苏州的繁荣更受到政令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受朝廷北运谷物政策的影响。更令人惊奇的是上海，这座经济城市同样典型。约翰逊(Linda Cooke Johnson)在书中反复指出行政命令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甚至在签订对外条约以前就已经是如此了。上海最初的兴起是由于1277年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设立；明代由于首都的北迁和海禁使上海陷入短暂的衰落；清前期海外贸易的重新开放和江海关在1730年的设立，使其再次成为内地贸易和海外贸易的联系通道。确实，当约翰逊论述“上海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的发展，都可

[1] Skinner,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219.

[2] Robert Hartwell, "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 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 750—135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0 (1967), pp. 102—159.